

童年晚期受欺负与社会支持的短期动态关系： 基于密集追踪的周记法研究

刘嘉妃*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2025年5月14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18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30日

摘要

目的：本研究采用密集追踪设计，系统探讨童年晚期儿童在受欺负经历与教师支持、父母支持和同伴支持之间的短期双向关系，旨在为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干预提供实证依据。方法：研究采用Olweus受欺负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对309名小学高年级学生进行连续八周、每周一次的问卷追踪，共获得2007份有效每周报告。结果：在控制前一周社会支持水平的基础上，前一周的受欺负经历显著预测本周的父母支持、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呈现出正向关系。然而，个体平均受欺负水平在跨层次上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较高的受欺负平均水平削弱了单周受欺负经历对父母支持和同伴支持的正向预测效应。换言之，对于整体欺凌经历较多的学生，受欺负之后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较低。结论：童年晚期学生的受欺负经历在短时间内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且其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整体受欺负程度较高的儿童更难主动寻求来自父母与同伴的支持，提示教育与干预实践应更加关注这一高风险群体，强化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响应与可及性。

关键词

周记法，受欺负，社会支持，教师支持，密集纵向模型

Short-Term Dynamics between Victimiz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during Late Childhood: An Intensive Longitudinal Weekly Diary Study

Jiafei Liu*

School of Psych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Received: May 14th, 2025; accepted: Jun. 18th, 2025; published: Jun. 30th, 2025

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ciprocal short-term relationships between victimiza-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刘嘉妃(2025). 童年晚期受欺负与社会支持的短期动态关系：基于密集追踪的周记法研究. *心理学进展*, 15(6), 364-371. DOI: 10.12677/ap.2025.156386

tion and perceived support from teachers, parents, and peers with an intensive longitudinal design, with the goal of identifying potential targets for futur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09 primary students in grades 5 and 6 reported their weekly experiences of victimization and perceived support from teachers, parents, and peers over eight consecutive weeks, resulting in 2007 weekly observations. **Result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corresponding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last week, higher-than-person-average levels of victimization on the past week significantly predict higher-than-person-average levels of teacher,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in the following week. However, social support in the past week wa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victimization. Cross-level moderation analyses further revealed that higher person-average-level victimization weakened the positive within-person associations between victimization and parent/peer support. In other words, children who generally experienced less victimiz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seek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peers when they encountered bullying. **Conclusion:**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study to use an intensive longitudinal design to explore the fluctuations of victimization, which show large short-term variabilities. Children with higher overall levels of victimization are less likely to seek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peers and thus require greater attention.

Keywords

Weekly Diary, Victimization, Social Support, Teacher Support, Intensive Longitudinal Modeling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跨文化研究表明, 学校欺负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及各种文化背景(Escuadra et al., 2023; Wei et al., 2024)。在中国, 校园欺凌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张文新(2002)发现, 已有五分之一被调查的儿童报告曾有过欺负他人或被他人欺负的相关经历, 显示出校园欺凌在我国的普遍性。学生受欺负后可能会产生一系列后果, 包括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 及自伤行为和物质滥用等行为问题(Ttofi et al., 2012)。这些问题也会随之对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因此, 系统探讨儿童受欺负行为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从而预防和减少学校霸凌行为。

儿童青少年的日常社会生活主要围绕三类关键人际关系展开: 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大量研究已表明, 来自父母、教师和同伴的支持是保护青少年免受欺凌的重要社会资源, 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通常与较低的受欺负风险显著相关(余宾等, 2025; 吴旻等, 2021; Ehrlich et al., 2012; Sentse & Laird, 2010)。尽管长期以来, 大量研究关注了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与儿童青少年的欺负受欺负行为的关系, 但这些研究多关注社会支持对受欺负行为的影响, 而较少关注受欺负行为对未来社会支持的预测效应。也就是说, 尚不清楚在经历欺凌后, 青少年是否会主动寻求重要他人的帮助或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多来自父母、教师和同伴的支持。此外, 既有研究多采用长时间跨度的追踪设计(例如数月或数年; Zych et al., 2020), 忽视了社会支持与欺凌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即时性或短期交互机制。

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采用密集追踪设计(intensive longitudinal design), 通过高频率、连续性的测量方式, 更精细地捕捉儿童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欺凌经历的波动特征以及其与外部资源之间的动态关系(段锦云, 陈文平, 2012; 张银普等, 2016)。例如, 利用日记法、周记法等工具, 可在数日或数周的时间范围内多次评估个体的受欺负经历与社会支持水平, 从而揭示两者之间的时间依赖性和方向性变化。同时, 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DSEM), 为分析这类密集追

踪数据提供了先进的统计工具,可在控制个体间差异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个体内水平上的短期因果路径与调节机制(方杰等, 2025)。

基于上述理论与方法进展,本研究采用为期八周的密集追踪设计,针对小学五、六年级处于童年晚期的学生群体,每周进行一次测量,以周为单位系统探讨父母支持、教师支持、同伴支持与受欺负经历之间的双向动态关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在个体层面上,高于其平均水平的父母、教师及同伴支持将预测其下一周更低水平的受欺负经历;2)同样地,高于个体平均水平的受欺负经历也将预测下一周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即受欺负后可能激发社会支持系统的反应。此外,考虑到个体间在社会适应能力与人际资源获取能力上的差异性,本研究进一步提出:3)上述个体内双向关系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受到个体整体社会支持水平与受欺负程度的调节。研究将综合探讨遭遇校园欺凌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短期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有望深化我们对校园欺凌过程的理解,推动构建更具生态效度的干预模型,为教育工作者、家长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行的行动指南,尤其是在如何有效识别和干预受欺凌高风险群体、如何提升社会支持系统的响应能力方面,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整群抽样,邀请深圳市某区的三所学校五六年级学生参与为期八周的周记法测查。施测期间学生可以随时退出研究。学生在每周的统一时间完成问卷调查。在八周的问卷调查中,共有 402 名学生完成了 2309 次问卷调查。剔除无效作答问卷后,309 名学生完成了四次及以上的有效问卷调查,形成 2007 个观测点的有效数据。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1.34 岁,标准差为 0.86 岁,其中男生 160 人(51.8%),女生 149 人(48.2%)。

2.2. 研究工具

2.2.1. Olweus 受欺负量表

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测量青少年的受欺负经历。张文新等(1999)对此进行了中文版修订。本研究对指导语进行了修改,使其适用于周记法研究。青少年报告最近一周内是否有过不同类型(身体、言语、和关系)的受欺负经历。三种受欺负类型各有两个条目。另外,另有一个条目测量青少年近一周内是否经历过网络受欺负。所有条目均采用从“没有”到“每天多次”的 0~4 计分。所有条目取平均分作为总分,分数越高表示有越多的受欺负经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2.2.2. 父母支持、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

被试通过三道题目报告过去一周的父母支持。三道题目分别为“过去的一周中,我得到了父母的帮助和支持。”“过去的一周中,我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安慰和关心。”以及“过去一周中,我和父母发生了矛盾。(反向计分)”(Griffin et al., 2019; 罗晓慧, 刘红云, 2024)。每周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均通过类似的三道题目进行测量。所有条目均采用从“从来没有”到“非常多”的 0~3 计分。父母、教师和同伴支持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1, 0.91 和 0.88。

2.3. 研究程序 and 数据处理

研究将收回的问卷在 SPSS28.0 进行整理,剔除无效问卷,并进行描述统计并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接着,使用 Mplus 8.0 进行动态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Mutheén & Mutheén, 2019)。三种社会支持的模型分别建模。按照方杰等人(2025)的建议,如图 1 所示,显变量社会支持和受欺负经历被分解为个体间潜变量(个体均值)和个体内潜变量(相对于个体均值的每周变化)两个部

分。在个体内层面，我们首先控制了变量的滞后效应，即上一周的受欺负对本周受欺负的自回归($\Phi_{\text{受欺负}}$)，以及上一周的社会支持对本周社会支持的自回归($\Phi_{\text{社会支持}}$)。之后，我们加入了两个变量的互相预测：上一周的社会支持对本周的受欺负经历(β_a)，以及上一周的受欺负经历对本周的社会支持(β_b)。这两者被设为随机效应，也就是该关系可以存在个体间的差异。

在个体间层面，即第2层，个体平均水平的受欺负经历和社会支持水平成为了一个被试间变量，用来预测层1估计的两个随机斜率(β_a 和 β_b ；方杰等，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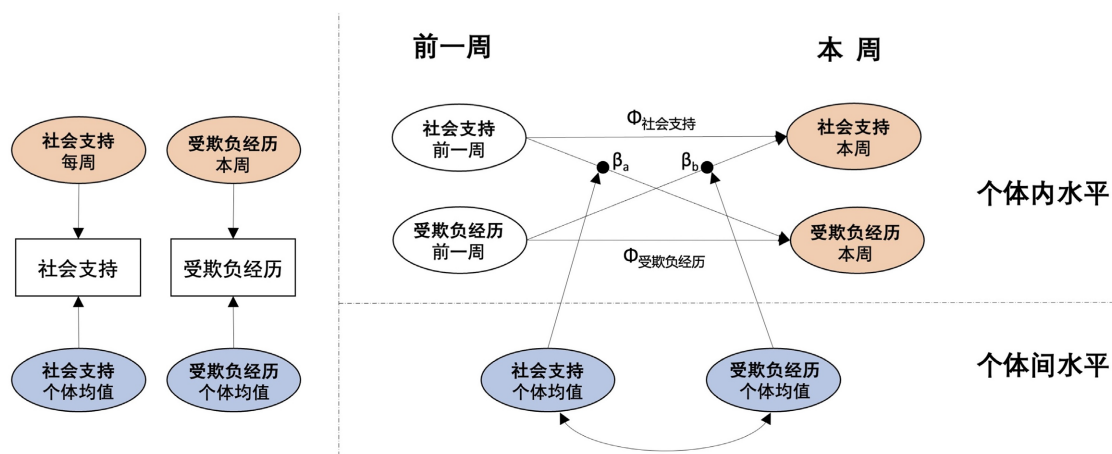


Figure 1. Cross-level moderation model

图 1. 跨水平调节效应模型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1 列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以及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受欺负和社会支持的 ICC 在 0.54~0.69 之间，这表明 31%到 46%的变量变异是由于被试内的变化，而其余的变异则来自于被试间。该数据证明了这些变量适合建立多水平模型，能够进行下一步分析。在被试间水平，受欺负与三种社会支持均呈现负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among variables at the between-person level

表 1. 主要变量的被试间水平相关分析

变量	ICC	<i>M</i>	<i>SD</i>	1	2	3	4
1 受欺负	0.54	0.15	0.37	—			
2 父母支持	0.63	2.26	1.15	-0.13*	—		
3 教师支持	0.62	2.15	1.10	-0.07*	0.84***	—	
4 同伴支持	0.59	2.33	1.17	-0.20***	0.78***	0.84***	—

注： $n = 309$ 。ICC = 组内相关系数。*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3.2. 社会支持与受欺负经历的短程双向关系

表 2~表 4 的个体内水平展示了在分离个体间变异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和受欺负经历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上一周的受欺负和对应类型的社会支持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下一周受欺负经历的关系均

不显著(95%CI 均包含 0)。然而,上一周的受欺负经历能够预测本周的父母支持、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95%CI 均不包含 0)。

3.3. 个体平均水平的社会支持和受欺负经历对短程关系的影响

受欺负的个体平均水平会削弱受欺负对父母支持的正向的关系($B = -0.44, p = 0.015$)。也就是说,对于整体经历了较多受欺负的个体,他们的受欺负与之后父母支持的关系会更弱。类似地,受欺负的个体水平也会削弱受欺负与下周同伴支持($B = -0.34, p = 0.023$)的正向的关系。对于整体受欺负经历较多的学生,受欺负与之后同伴支持的关系更弱。

Table 2. The multilevel model of parent support
表 2. 父母支持的多水平调节模型

类别	<i>B</i>	95%CI 下限	95%CI 上限	β
个体内水平				
受欺负 $t-1 \rightarrow$ 受欺负 t	0.07*	0.02	0.11	0.04*
父母支持 $t-1 \rightarrow$ 父母支持 t	0.08***	0.03	0.11	0.06***
父母支持 $t-1 \rightarrow$ 受欺负 t (斜率 a)	0.01	-0.02	0.02	0.01
受欺负 $t-1 \rightarrow$ 父母支持 t (斜率 b)	0.37***	0.22	0.60	0.06***
个体间水平				
父母支持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a	-0.01	-0.03	0.02	-0.06
父母支持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b	-0.02	-0.26	0.20	-0.02
受欺负的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a	-0.02	-0.07	0.03	-0.09
受欺负的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b	-0.44*	-0.82	-0.07	-0.14*
斜率 a 的 R^2	0.03	-	-	-
斜率 b 的 R^2	0.04	-	-	-

Table 3. The multilevel model of teacher support
表 3. 教师支持的多水平调节模型

类别	<i>B</i>	95%CI 下限	95%CI 上限	β
个体内水平				
受欺负 $t-1 \rightarrow$ 受欺负 t	0.06***	0.02	0.11	0.04***
教师支持 $t-1 \rightarrow$ 教师支持 t	0.05*	0.01	0.09	0.04**
教师支持 $t-1 \rightarrow$ 受欺负 t (斜率 a)	-0.01	-0.02	0.02	-0.01
受欺负 $t-1 \rightarrow$ 教师支持 t (斜率 b)	0.23**	0.03	0.39	0.05***
个体间水平				
教师支持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a	0.03	-0.20	0.32	0.03
教师支持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b	0.02	-0.01	0.04	0.01
受欺负的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a	-0.10	-0.49	0.24	-0.01
受欺负的平均水平 $\rightarrow$ 斜率 b	-0.08	-0.19	0.03	-0.02
斜率 a 的 R^2	0.02	-	-	-
斜率 b 的 R^2	0.05	-	-	-

Table 4. The multilevel model of peer support
表 4. 同伴支持的多水平调节模型

类别	<i>B</i>	95%CI 下限	95%CI 上限	β
个体内水平				
受欺负 <i>t</i> - 1→受欺负 <i>t</i>	0.07*	0.02	0.11	0.04*
同伴支持 <i>t</i> - 1→同伴支持 <i>t</i>	0.06*	0.01	0.11	0.04*
同伴支持 <i>t</i> - 1→受欺负 <i>t</i> (斜率 <i>a</i>)	-0.01	-0.03	0.01	-0.02
受欺负 <i>t</i> - 1→同伴支持 <i>t</i> (斜率 <i>b</i>)	0.27**	0.13	0.45	0.04***
个体间水平				
同伴支持平均水平→斜率 <i>a</i>	-0.01	-0.02	0.02	-0.01
同伴支持平均水平→斜率 <i>b</i>	-0.05	-0.25	0.18	-0.06
受欺负的平均水平→斜率 <i>a</i>	-0.01	-0.06	0.03	-0.07
受欺负的平均水平→斜率 <i>b</i>	-0.34*	-0.63	-0.05	-0.12*
斜率 <i>a</i> 的 <i>R</i> ²	0.04	—	—	—
斜率 <i>b</i> 的 <i>R</i> ²	0.03	—	—	—

4. 讨论

在八周的测量时间段内，有 59% 的被试未在任何一次调查中报告受欺负经历。而有 22% 的被试仅在其中一次或者两次调查中报告了受欺负经历，在其余时间均为未受欺负。这也与已有研究一致，即大部分的学生并未卷入受欺负中(Zheng et al., 2024; Zych et al., 2020)。但也值得注意的是，仍有 19% 的学生频繁且持续地报告被欺负经历，表明该部分儿童青少年长期处于遭受欺凌的状态，需要引起密切关注。

在本研究中，高于个体均值水平的受欺负经历能够预测下周高于个体均值水平的父母支持、同伴支持和教师支持。这表明整体而言，个体遭受到欺负后，可能会或主动寻求来自身边重要社会关系的帮助，或者被动地得到他人的更多关注。这与 Burke et al. (2017) 的研究一致，表明受欺负之后的社会互动可能具有一定的补偿性质。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拓展了对受欺负和社会支持关系的理解，首次通过密集纵向模型在短时间尺度上验证了短期内的动态关联，为以往多集中于长程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与假设不符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社会支持对受欺负经历的跨周预测作用。这有三种可能的解释：首先，较高的社会支持并不直接作用于降低受欺负风险，而是能够增强儿童青少年的韧性或者提高应对策略，从而降低受欺负经历的不良后果(Cheng et al., 2025)。缓冲假说(buffering hypothesis)也主张，社会支持也许无法预防压力事件的发生，但可以有效缓冲其对心理的负面影响(Cohen & Wills, 1985)。因此，社会支持与受欺负经历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或者或表现为调节变量，即通过社会支持减弱欺凌经历与心理困扰之间的联系。第二，社会支持对受欺负经历的作用需要长程体现，短时间的高于个体均值的社会支持并不会对受欺负经历产生保护作用。第三，社会支持对受欺负经历存在短程保护作用，但其作用周期并不以“周”为单位，这种短程的社会支持可能只存在于当天，或者几个小时。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更高频率的追踪方式，或者是事件抽样法(段锦云，陈文平，2012；张银普等，2016)，以捕捉社会支持对欺凌动态关系的更为精细的变化过程。另外，还需要考虑其他潜在变量对社会支持与受欺负关系的影响，例如个体的人格特质，如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社会关系的质量，如师生关系质量、亲子关系质量和同伴关系质量都可能影响短期的动态关系，以及学校的整体气氛，都可能在该短期关系中起到调节和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整合多层面的因素构建更全面的解释模型。

在跨水平的调节分析中发现, 个体的整体受欺负水平会显著削弱其在单周内遭遇欺凌后获取社会支持的倾向。具体而言, 对于那些整体受欺负程度较高的青少年而言, 即使在某一周受到更严重的欺凌, 他们也较少主动寻求来自父母与同伴的支持。这可能与其长期处于被欺负的状态有关, 使其逐渐形成“习得性无助”或对外部帮助的低预期(Hamilton et al., 2015)。这一发现提示我们, 传统的基于“个体主动求助”路径的干预机制可能对此类群体效果有限, 必须依赖教师、家长和同伴的积极识别与主动介入, 以打破其被动接受欺凌的恶性循环。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城市学校, 因而研究结论在推广至农村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群体时应保持谨慎。其次, 本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法, 可能受限于个体主观判断与社会期望偏差。未来研究可考虑引入同伴提名、教师评估等多源数据, 以增强结果的客观性与信度。

综上所述, 本研究首次使用高密度纵向追踪设计, 在为期八周的时间内探讨了受欺负经历与社会支持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 不仅揭示了这一关系的高度变异性与时间敏感性, 还指出了社会支持在欺凌后发挥的即时补偿作用以及在高受欺负个体中可能失效的机制。这些发现为欺凌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未来应更加关注社会支持系统的可达性与响应速度, 尤其是对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群体, 应重构其信任社会网络的能力与意愿, 从而有效提升他们在面对欺凌时的自我保护资源与能力。

参考文献

- 段锦云, 陈文平(2012). 基于动态评估的取样法: 经验取样法. *心理科学进展*, 20(7), 1110-1120.
- 方杰, 温忠麟, 王惠惠, 顾红磊(2025). 密集追踪数据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学报*, 57(5), 915-934.
- 罗晓慧, 刘红云(2024). 密集追踪研究中测验信度的估计: 多层结构和动态特性的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32(4), 700-714.
- 吴旻, 周欣然, 叶攀琴, 孙丽萍(2021). 师生、同伴、亲子关系对农村小学寄宿生心理资本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2), 230-235.
- 余宾, 郭成, 缪华灵, 彭于珏(2025). 师生关系与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 自尊和亲子亲合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41(1), 99-108.
- 张文新(2002). 中小学生对欺负/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 *心理学报*, 34(4), 387-394.
- 张文新, 武建芬, Jones, K. (1999).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15(2), 7-11.
- 张银普, 骆南峰, 石伟(2016). 经验取样法——一种收集“真实”数据的新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24(2), 305-316.
- Burke, T., Sticca, F., & Perren, S. (2017).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The Longitudinal Interplay among Social Support,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 1999-2014.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7-0653-0>
- Cheng, Q., Mills-Webb, K., Marquez, J., & Humphrey, N. (2025).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acros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Friendship and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Early-to-Middle Adolescence: A Developmental Cascades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4, 1377-1395.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24-02131-2>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310-357.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8.2.310>
- Ehrlich, K. B., Dykas, M. J., & Cassidy, J. (2012). Tipping Points in Adolescent Adjustment: Predicting Social Functioning from Adolescents' Conflict with Parents and Friend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 776-783. <https://doi.org/10.1037/a0029868>
- Escuadra, C. J., Magallanes, K., Lee, S., & Chung, J. Y. (2023). Systematic Analysis on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 Using Data Mining.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50, Article ID: 107020.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3.107020>
- Griffin, A. M., Sulkowski, M. L., Bámaca-Colbert, M. Y., & Cleveland, H. H. (2019). Daily Social and Affective Lives of Homeless Youth: What Is the Role of Teacher and Peer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77, 110-123. <https://doi.org/10.1016/j.jsp.2019.09.004>
- Hamilton, J. L., Connolly, S. L., Liu, R. T., Stange, J. P., Abramson, L. Y., & Alloy, L. B. (2015). It Gets Better: Future Orientation Buffers the Development of Hopeless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ollowing Emotional Victimization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3, 465-474.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4-9913-6>

-
- Mutheñ, B. O., & Mutheñ, L. K. (2019). *Mplus Version 8: User's Guide*. Mutheñ & Mutheñ.
- Sentse, M., & Laird, R. D. (2010).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Dyadic Friendship Experiences as Predictors of Behavior Problem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9, 873-884.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6.2010.517160>
- Ttofi, M. M., Farrington, D. P., & Lösel, F. (2012). School Bullying as a Predictor of Violence Later in Lif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ie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7, 405-418.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2.05.002>
- Wei, X., Liu, D., Cheung, H. N., & Williams, J. M. (2024). Exploring the Mediation Role of Self-Compassion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Depression: A Cross Culture Comparison Study.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63, Article ID: 107816.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4.107816>
- Zheng, H., Zhou, Y., Fu, L., Eli, B., Han, R., & Liu, Z. (2024). A 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of Aggression Victimization Patter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to Middle School.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3, 1564-1578.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23-01931-2>
- Zych, I., Ttofi, M. M., Llorent, V. J., Farrington, D. P., Ribeaud, D., & Eisner, M. P. (2020).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Stability and Transitions among Bullying Roles. *Child Development*, 91, 527-545. <https://doi.org/10.1111/cdev.13195>